



理解中国丛书
Understanding China Series

赵剑英 主编
Zhao Jianying Editor

Concise Reader of Chinese Culture

中华文化简明读本

于春松 著

By Gan Chunso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赵剑英 主编
Zhao Jianying Ed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Concise Reader of Chinese Culture

中华文化简明读本

于春松 著

By Gan Chunso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化简明读本 / 于春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5161 - 9315 - 0

(理解中国丛书)

I. ①中… II. ①于… III. ①中华文化—通俗读物 IV. ①K203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875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茵 孙萍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16 千字
定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理解中国》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王伟光

编委会副主任：李 扬 李培林 蔡 昉

编委会成员（以拼音字母为序）：

卜宪群	蔡 昉	高培勇	郝时远	黄 平
金 碚	李 林	李培林	李 扬	马 援
王伟光	王 巍	王 镭	杨 义	周 弘
赵剑英	卓新平			

主编：赵剑英

编辑部主任：王 茵

编辑部成员：孙 萍 朱华彬 喻 苗

出版前言

自鸦片战争之始的近代中国，遭受落后挨打欺凌的命运使大多数中国人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改变“西强我弱”和重振中华雄风需要从文化批判和文化革新开始。于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学习日本、学习欧美以至学习苏俄。我们一直处于迫切改变落后挨打、积贫积弱，急于赶超这些西方列强的紧张与焦虑之中。可以说，在一百多年来强国梦、复兴梦的追寻中，我们注重的是了解他人、学习他人，而很少甚至没有去让人家了解自身，理解自身。这种情形事实上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亦无明显变化。20世纪80、90年代大量西方著作的译介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历史。

但与此并行的一面，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强国梦、中华复兴梦的追求中，通过“物质（技术）批判”“制度批判”“文化批判”一直苦苦寻求着挽救亡国灭种、实现富国强民之“道”，这个“道”当然首先是一种思想，是旗帜，是灵魂。关键是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

的旗帜、什么样的灵魂可以救国、富国、强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屈辱、失败、焦虑中不断探索、反复尝试，历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实践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道路的破产，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终于走出了中国革命胜利、民族独立解放之路，特别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结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还不完善，但可以说其体制制度基本成型。百年追梦的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姿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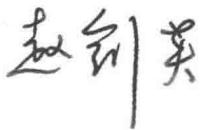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长期以来形成的认知、学习西方的文化心理习惯使我们在已然崛起、成为当今世界大国的现实状况下，还很少积极主动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自己——“历史的中国”和“当今现实的中国”。而西方人士和民族也深受中西文化交往中“西强中弱”的习惯性历史模式的影响，很少具备关于中国历史与当今发展的一般性认识，更谈不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了解，以及“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对于中国的科学性、有效性及其对于人类文明的独特价值与贡献这样深层次问题的认知与理解。“自我认识展示”的缺位，也就使一些别有用心不同政见人士抛出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等甚嚣尘上。

可以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学习西方和认识世界上，并习惯用西方的经验和话语认识自己，而忽略了“自我认知”和“让别人认识自己”。我们以更加宽容、友

好的心态融入世界时，自己却没有被客观真实地理解。因此，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总结出来，讲好中国故事，讲述中国经验，用好国际表达，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民众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是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无疑是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学术文化研究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担当。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本院一流专家学者和部分院外专家编撰了《理解中国》丛书。这套丛书既有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总的梳理和介绍，又有从政治制度、人权、法治，经济体制、财经、金融，社会治理、社会保障、人口政策，价值观、宗教信仰、民族政策，农村问题、城镇化、工业化、生态，以及古代文明、文学、艺术等方面对当今中国发展的客观描述与阐释，使中国具象呈现。

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使国内读者更加正确地理解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更加理性地看待当前面临的难题，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和民族自信，凝聚改革发展的共识与力量，也可以增进国外读者对中国的了解与理解，为中国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2014年1月9日

目 录

第一章 考古发现与中华文明起源.....	(1)
一 “满天星斗”与“炎黄子孙”	(1)
二 红山文化与“龙的传人”	(4)
三 二里头与“夏”	(7)
四 殷墟与早期城市.....	(9)
五 中国神话与《山海经》	(14)
第二章 天下国家与制度礼俗	(21)
一 中国的疆域沿革	(21)
二 中国的行政区划沿革	(28)
三 宗族与宗法	(32)
四 天下制度	(39)
五 封建制与郡县制	(43)
六 禅让与世袭	(48)
七 天子与皇帝	(54)

八 辅政制度与中国古代的文官系统	(59)
九 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	(64)
十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	(68)
十一 科举与书院	(76)
十二 礼法合治与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	(83)
十三 近代法律转型中的礼法之争	(91)
十四 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	(98)
十五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	(108)
十六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114)
第三章 思想与信仰	(121)
一 早期中国思想的形成	(121)
二 中国思想文化形态的演进脉络	(127)
三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	(149)
四 中国思想的主要派别	(170)
第四章 艺术与审美	(205)
一 礼乐文明：仪式、音乐与秩序	(205)
二 儒释道与中国的审美文化	(210)
三 唐诗和宋词	(214)
四 明清小说	(224)
五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人画	(232)
六 中国建筑的伦理与审美	(241)

第五章 中外文化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248)
一 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248)
二 中医文化与中西医结合·····	(255)
三 “各美其美”与人类文明共同体·····	(260)
参考文献·····	(267)
索引·····	(269)
后记·····	(275)

第一章

考古发现与中华文明起源

考古的发现对于了解一个地区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来自考古遗存和传世文献资料方面的证据，那么许多历史的记载就只能算是“传说”。20 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疑古”泛滥，特别是以顾颉刚为主的“疑古派”对夏朝及尧、舜等古代圣王是否真实存在持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考古学科成立以来，有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又为我们了解远古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提供了可靠的素材。在这些发现中，有包括距今 170 万年前、具有人种起源意义的元谋人，以及稍后的蓝田人和北京周口店附近发现的北京猿人等，其中北京猿人被认为与黄种人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关系。

在此之后，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直接相关的更多考古发现也越发受人关注。这些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使我们得以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的历史进行一种轮廓性的描述。这些材料也提示着，《史记》中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并非只是“虚构”，其中有丰富的历史信息。

◇一 “满天星斗”与“炎黄子孙”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

形成期的空间分布十分广阔，南到广东、北到黑龙江直至目前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地区。气候条件跨越了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如此广阔的地理区域，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方式，留下了面貌各异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也就是为何有人将这样的起源方式概括为“满天星斗”的原因。

综合考古学家的看法，到公元前 4000 年前后，大约是相当于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经历了突破性的发展。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公元前 4000 年至前 3300 年，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空前繁荣。大约相同的时期，长江中下游也进入了繁荣期。第二阶段自公元前 3300 年至前 2500 年或稍晚，以长江中下游、钱塘江南岸的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社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文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区，在公元前 3500 年前后开启文明化的进程后，稳定发展。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西地区，其文明化起步的时间和海岱地区相近，许多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其曾经的繁荣。第三阶段是公元前 2500 年至前 2000 年时期，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突然涌现出一批城址，诸如金沙、三星堆等，而长江中下游和辽西的文明却衰落了。不过，中原文化却再度“复兴”，陕西、河南、山西等地重新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推动者。

这些不同的文化起源和不同阶段的文明发展之间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从而使语言、信仰和习俗等方面不断接近，最终构成一种“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态。

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注，古人的努力可能要超出现代人的想象，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历代史家，根据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文献材料进行了创造性的综合，虽然有一些“想象”的成分，但亦非完全虚构。比如，中国人一般自称“炎黄子孙”，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

《国语·周语》，该文提出鲧、禹和夏人之后，以及姜姓之后，都是黄帝和炎帝的后代。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而后来的帝王都是黄帝的直系子孙，由此，黄帝也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即文明历史开端意义上的开创者。

其实，司马迁将黄帝塑造为中华传统始祖的做法自有其价值的依据。在春秋时代，孔子与他的学生可能就已经开始讨论有关黄帝的传说。据《大戴礼》记载，孔子与宰我有过如下的对话：“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在孔子看来，黄帝是否真活了三百年并不重要，关键是生民得其利，而后世的人敬畏和接受其教化共三百年。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的长度是以他为人类所做的贡献来衡量的。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纪》即是将上古中国的许多伟大的事功都归结到黄帝身上，因而赋予黄帝以特别的意义。

历史上中华文明区域内的其他民族，有时也会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比如辽代的契丹族就在描述他们民族历史的典籍中称自己是黄帝的子孙。这样的说法，也可以看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在民族观念中的体现。

虽然，对黄帝本人考证具有许多“想象”的成分，不过，在历史上也一直有人试图进行“实证”性的证明。如宋代学者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大意在于运用《周易》中数的理论推究宇宙起源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规律。在该书中，邵雍说道，黄帝元年距今四千六百二十五年，书中还将尧元年称为甲辰年。据清末民初学者卢景贵考订，认为黄帝元年相当于公元前 2357 年。再据更久远的晋代学者皇甫谧

所作的《帝王世纪》推算，尧以上共有五帝，历时 341 年。按照这个说法，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 2698 年，这一论断后来得到广泛接受。近代以来，随着民族观念的传入，“炎黄子孙”的观念，被用来激励国人团结起来，抗击外侮。针对西方人采用耶稣纪年的做法，许多学者提出了“黄帝纪年”，最著名的例证是 1912 年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 4609 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虽然孙中山的做法有政治上的考虑，不过，将黄帝看作中华五千年历史的起源已经广为接受。

黄帝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关于他的事迹，尽管夹杂有许多神话传说和比附的内容，然而因为在中国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中，以黄帝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由此确立了黄帝的开端性地位。

◇◇二 红山文化与“龙的传人”

如果黄帝是由众多的早期的杰出人物而逐渐凝聚的种族始祖，而“龙”则堪称是文化的图腾。

20 世纪 70 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一位农民在修梯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发现了一块像钩子一般的石头，这块石头口闭吻长，上棱起翘，吻前伸上翘，身体如铁钩一般细长卷曲。不过，这件造型独特的石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辽宁省建平县出土了一批玉制品，经考古学家考证，这一批文物与十几年前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文物属于同一时期的文明类型，并因发现地赤峰而命名为“红山文化”。在这批新发掘的文物中，其中有一件玉器十分罕见，出土后甚至引起了考古

界和学术界的争论。这一玉器形似玉猪，却身形修长弯曲、首尾相连，体现出龙的特征，猪首含有獠牙，肥头大耳，与赤峰地区的石钩般的玉器颇有相似之处。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考证，这两件玉器均属于红山玉龙，是红山文化的重要见证。

其实，在红山的玉龙出土之后，一直有关于“龙”的考古发现。1987年8月，在河南省濮阳市的西水坡遗址发现了一组属于仰韶文化的遗迹。在其中的45号墓中，发现了以蚌壳摆放的龙虎图案。龙昂首曲颈、拱背、体弯曲、长角、大眼、张口露舌、显齿、足端有四个至五个尖爪。这大约能说明当时已经有比较固定的龙的形象，而这件距今大约6000年的龙图案，也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在新石器时期的中晚期，大约距今6700—4000年的这段时间的不同地区考古发现中，龙的形象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虽然龙的头部形象各有不同，有的是人头，有的是猪头，也有类似马和鹿甚至鱼的头的，然而身上有鳞、体弯曲、有爪等核心特征却是一致的，这表明这种图腾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而在《史记》中，炎帝的出生，就被描述为其母游华阳时与“神龙首”相感而生。也因为龙在中国早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

龙不仅出现在考古发现中，也经常出现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在这些作品中所出现的“龙”既能行云布雨，又能飞沙走石，既有禳灾除祸的善行，又有作恶多端的劣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我们不乏龙的形象，人们熟悉龙的喜好和习惯，甚至熟悉它所生九子的各自不同的功能，屠龙术和叶公好龙的记载也早已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但龙却是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早已无法确切对应的神兽。可是，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中国古人曾严肃地讨论龙是否真实存在：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

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蓄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

……

献之曰：“今何故无之？”

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物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在这段文献中，魏献子与蔡墨讨论何以不得见龙的原因，魏献子认为，或许是因为龙是最具有智慧的动物，所以人无法捕获而得见。蔡墨却认为，古代有专门负责豢养、驯育各种动物和神兽的职官，这类职官的功能世代相传，亦有相应的名号和姓氏。而豢养龙的职官因为失职，导致龙得不到精心的照料，故而隐匿，人便不得见。但是，蔡墨极其坚定地认为“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从上述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确信龙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没人见过而已。以现在的眼光看，龙是人们综合不同动物的因素而糅合在一起，并赋予其非凡的“法力”。而这一图腾信仰在后世时间的磨砺中，龙的形象不断演变，其文化含义、思想意蕴愈益丰富，最终成为中华文明乃至华夏民族精神的崇高象征，逐渐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共同信仰和统一的意义符号。

◇三 二里头与“夏”

《论语·八佾》篇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在这里孔子说道，他对夏和殷商的“礼”虽然能言说，但并不能以杞国和宋国来引证，因为文献上的证据并不充分。这里所说的夏和殷，一般指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两个王朝，而在儒家的叙事体系中，夏、商、周也被视为是理想政治的范型，即所谓的三代之治。

但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夏朝是否存在却是饱受争议的，理由依然是缺乏足够的考古材料做证据。1928年，随着甲骨文的被发现，董作宾等人在中研院考古所的决定下开始发掘安阳殷墟，直至20世纪中期，商王朝的存在有了无可辩驳的依据，但是关于夏的存在，无论是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还是都城遗址，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杰出的历史学家杨宽和考古学家陈梦家，都否认了夏王朝的存在，他们认为关于夏的种种记载，无非是周人依据神话传说辗转演义而成，或者是从商朝的历史中分出来的。那么，大禹中断了禅让而将帝位继承给启的历史转折，还有荒淫的夏桀的记载难道都是后世的历史编纂者杜撰的吗？

为了解开关于中国早期历史上的种种谜团，徐旭生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走访二里头一带重要遗址，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为夏王朝的考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李学勤等专家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研究课题，试图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对地下地上文献进行综合研究，以确定早期中国历史